

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 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

吴原元

摘要 域外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诸说中,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所流布的主要是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安特生的新西来说以及毕士博、滨田耕作的“渗入型”文明说。对于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出于排满、提振国人文化自信的目的,中国学人多有附和。五四之后,随着疑古之风兴起,拉克伯里西来说受到民国学人的质疑、否定与批判,并于20世纪30年代逐渐消失。安特生基于考古实物所提出的新西来说,虽不乏质疑者,但有相当的人持肯定或谨慎认同态度。至20世纪30年代末,伴随着考古挖掘的新进展和民族危机的加剧,新西来说渐为民国学人所普遍抛弃。中国文化系“渗入型”文明之说,虽受到民国知识界的一定关注,然由于文化民族主义渐成主导性思潮,其一开始即为民国知识界所质疑或否定。民国知识界对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之质疑与否定乃至批判所以呈渐趋普遍之势,既是学术本身发展所致,更主要的还在于文化认同危机使然。

关键词 域外 中国文明起源 民国学人 回应 文明互鉴

DOI:10.16240/j.cnki.1002-3976.2023.03.015

中国文明是从未被中断而绵延传承至今的文明,其起源问题一直是域外学人的兴趣所在,正如著名美籍德裔汉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所言,“在对中国展开科学研究的诸多问题中,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最为重要也最为迷人的问题”^①。明社将屋之际,随着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中国文明起源即成为西人讨论的话题,“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的各种“新说蔚起”^②。然而,西方思想传入以前,中国文明起源并不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论题,很早以前中国就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一套体系予以充分说明。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的加剧,“中外文化之间是否存在源流关系”这一时代课题遂揭橥而出,引发中国学人的关注与讨论,成为清末民初以来引人注目的一

个学术现象。因此,就国内学人是如何看待与回应域外学人所主张的中国文明外源说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不仅可厘清他们对此问题的态度及时代演化之概况与轨迹,更可管窥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和文化思潮的递嬗演进之面向,因为时人对中国文明外源说的回应并不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它还关涉彼时的文化思潮之趋向。

^① Berthold Laufer, “Some Fundamental Idea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1914(2).

^② 有关民初之前域外学人所提出的诸种中国文明起源说,参见法国学者考狄(Henri Cordier)1920年出版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Etrangers*)第一章;1929年,何炳松在《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上以《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为题,详述考狄书中所引所注的中国文明起源诸说,并对其加以分析批判。

有关域外之中国文明外源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流布与回应,国内学术界虽有学人以吕思勉为个案探究其对“汉族由来问题”的认识嬗变^①,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中国文明西来说”在清末中国的传布及其为中国学人所认同接受之原因的探讨^②,以及围绕安特生(Johan G. Andersson)之“仰韶文化西来说”展开论争的梳理^③,兼及安特生与中国学人的学术互动^④。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系统的整体性梳理与分析,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文明之“西来说” 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

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以前,域外有关中国文明外来之说名目繁多,有埃及说、巴比伦说、中亚说、印度说、印度支那说、新疆说,等等。彼时域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之说,主要是使用文字和语言材料,以文字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起源问题,通过文字语言等方面的异同比较论证中国文明源自外来。传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拉克伯里的“西来说”。1894年,拉氏出版《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他在书中称巴克即百姓,黄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长,神农即巴比伦之莎公,仓颉即但克,巴克本该地首府之名;又谓学术、技术、文字、文学,中国当上古时,无不与巴比伦迦克底亚相同^⑤。为论证其观点,拉氏即采用比较语言学方法,将中国的语言、文字、历法、神话、古史传说和西方亚述学关于古巴比伦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旨在说明“整个中国文明只不过是巴比伦文明的退化模仿”^⑥。

拉克伯里之说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由日本始传布于清末知识人的话语世界^⑦。对于拉氏之说,彼时中国学人中不乏嗤之以鼻者。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即言,“欧人云云,亦以偏概全”,并言“近人言吾族从巴比伦迁来,据下文最近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余年后,法、德、美各国人,数次在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观之,则古巴比伦人与欧洲人之文化相去近,而与吾族之文化相去远,恐非同种也”^⑧。然而,多数学人“骇其说之新奇,先后从风”^⑨。蒋智由著《中国人种考》,首倡拉氏“西来说”。刘师培、章炳麟等依据其丰富的中国古文献

知识,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勘音释义,积极呼应拉氏之说。金为翻译桑原鹭藏的著作时,特以注解的方式在译文中加进“西来说”内容^⑩。缪凤林如是言道:“乃者自前世纪中叶以降,西人或考察东亚地质人类,或探索中国文化。因溯及吾国民族之由来,于是周秦以来学人所未论列者,一时甚嚣尘上,异说纷纭,莫可究诘。……而其最占势力者,莫如法人拉克伯里自美索布达米亚西来之说。”^⑪柳诒徵亦谓:“法人拉克伯里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引据亚洲西方古史,证中西事物法制之多同,而彼间亦实有民族东迁之事。于是中东学者,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

- ① 王传:《变与常:吕思勉与“汉族的由来”问题研究》,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1年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 ② 具体参见杨思信《拉克伯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反响》(《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邹诗鹏《文明的自识与自信——“中国文明西来说”及其评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以及李帆《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关于拉克伯里学说进入中国的若干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等。
- ③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第一章《中华文明起源的争鸣》,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周书灿:《仰韶文化西来说的形成及论争——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等。
- ④ 陈星灿、马思中:《胡适与安特生——兼谈胡适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考古学的看法》,《考古》2005年第1期;《李济与安特生——从高本汉致李济的三封信谈起》,《考古》2007年第2期等。
- ⑤ 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 London: Asher, 1894, p. 24.
- ⑥ 徐艳主编:《朗宓榭汉学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 ⑦ 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 ⑧ 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转引自《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 ⑨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1925年第37期。
- ⑩ 桑原鹭藏:《东洋史要》,金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第14页。
- ⑪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1925年第37期。

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如刘光汉之《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立国篇》,章太炎之《种姓篇》,蒋观云之《中国人种考》,及日本人所著之《兴国史谭》等,虽各有主张,要无不以人种西来之说为可信。”^①

民初,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在中国知识界仍不乏信奉者。创刊于1910年的《地学杂志》,刊载了《中国种族考》《中国民族溯源论》等不少袭取“西来说”之文^②。熊秉穗在《中国种族考》一文中即谓:“综观亚洲各大民族及欧洲白种,无一不有迁徙,且能徙善地则盛强。然则黄帝来自西方之说,不为无理。”^③1915年,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以《穆天子传》为主要资料考证中华民族西来之有关史迹,称:“五大洲立国最早者,莫如埃及与迦勒底。埃及弗论,而迦勒底朝八十六代,均在西元前二千三四百年以上,是先于吾国五帝数千年矣。故五帝之世所称为神圣创造之物,无一非彼间所已有,用是知中国人种,由彼而来,非同臆说。”^④1918年,章鸿钊在所著《三灵解》中称:“朔轩辕氏东征之迹,其必由衡山钟山复逾昆仑,而后入于中夏,繁衍其子孙民族,以肇造此泱泱古大邦。”^⑤吕思勉在其最早的史著《白话本国史》(1923年)中,亦完全接受拉氏的“西来说”。他在是书的开篇即指出,回答“汉族由来”问题“最为有力”的是“西来说”。为进一步证明拉氏“西来说”,吕思勉还举出中国古书提及“昆仑”的文字甚多及“汉族”二字系“古代汉族自称”这两条自认为更为“严谨”的证据^⑥。对此,缪凤林评论道:“一般讲述历史、编纂地理者,大率奉为圭臬。”^⑦陈嘉异亦谓:“吾国人之编历史地理教科书籍者,则几无不奉西来说为根据。”^⑧张星烺也持有类似之论:“十余年前,全国学子,翕然景从”^⑨。

拉克伯里的“西来说”之所以在清末民初“最为学者所信”^⑩,盖因排满革命之需要,藉“西来说”以确立汉族对自身历史的认同^⑪。诚如方豪所言:“此说最受清末民初中国学人之欢迎,以当时反满之情绪甚高,汉族西来之说,可为汉族不同于满族之佐证。”^⑫当然,更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维护民族文化的自尊,以求立身于世界之林。当时民族危机日深,民气低沉,国人的文化自信力大为下降,唯西是尚甚至成为风气。在此种情形之下,如果能证明中西文化同出一源,“皆为有德慧术知之氓”^⑬,则无疑有助于提振国人的文化自信。正是这种“藉历史以论证现实”的文化民族主义心态,使得彼时的知识分子对

于中国文明外来说极表赞成,并曲尽附会,希冀强化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力,这即是蒋智由所谓“讲明吾种之渊源,以团结吾同胞之气谊,使不敢自惭其祖宗,而陷其种族于劣败之列焉”^⑭。

颇为值得注意的是,曾撰文积极呼应拉克伯里“西来说”的章炳麟于1907年开始在《民报》上刊文对“西来说”提出质疑和批判。他称:“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以否,于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⑮民国时期他再次修订《诂书》时,将其赞成“西来说”之内容“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东逾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大嶧,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改为“征之六艺,非也”^⑯。主张排满革命、倡导黄帝纪年的宋教仁,亦有类似之转变。他在撰于1905年的《汉族侵略史·叙例》一文中曾称:“太古之汉族,自西南亚细亚迁徙东来。”^⑰一年后,他在1906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则如是写道:“观《中国人种考》,系诸暨蒋观云所作,搜罗众说颇众,但不免失之支蔓而已。至其主张汉族西来说

① 柳诒徵:《述学:中国文化史》,《学衡》1925年第46期。

② 具体参见《地学杂志》1911年第8期、1912年第3、4期以及1914年第10期至1915年第3期。

③ 熊秉穗:《中国种族考》,《地学杂志》第3卷第3、4期,1912年。

④ 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附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三册《穆天子传地理考证》之后,台北,正中书局,1962年,第1401页。

⑤ 章鸿钊:《三灵解》,1918年排印本,第26页。

⑥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载《吕思勉全集》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⑦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1925年第37期。

⑧ 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1921年。

⑨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第77页。

⑩ 柳诒徵:《述学:中国文化史》,《学衡》1925年第46期。

⑪ 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⑫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2页。

⑬ 章炳麟:《原人》,载《诂书》(初刻本 重订本),朱维铮编校,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页。

⑭ 蒋智由:《中国人种考》,新报社光绪三十二年(1906)版,第171页。

⑮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1907年7月5日。

⑯ 《章太炎全集》(三),朱维铮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⑰ 宋教仁:《汉族侵略史·叙例》,《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第1期,载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中,黄帝系迦勒底帝廓特奈亨台与否之问题,汉族系丢那尼安族与否之问题,神农系塞米底族之吾尔王朝之沙公与否之问题,则犹无确切之解释也。”^①

质疑与批判拉氏之说,到五四之后则成为民国知识界的主潮。1922年,梁启超对中国文明“西来说”质疑道:“吾以为在现有的资料下,此问题只能作为悬案。中国古籍所记述,既毫不能得外来之痕迹,若拾文化一二相同之点,攀引渊源,则人类本能不甚相远,部分的暗合,何足为奇。”^②在朱希祖看来,“挽近言汉族西来者,大都取证于汉魏以来伪造之纬书神话。一二欧洲人士,亦都接近此辈,不学无术,妄相附会,驯至积学之士,亦震其新奇,从而附和之”,他从文字学角度对“西来说”及章太炎之附会大加驳斥,力证中国人种实发生于本部,“西来说之无确证”^③。对于朱希祖的驳斥,陈钟凡大加赞赏,称经其所证,“拉氏之言,实未足信。卓哉此说,足以释诸家之惑矣”。在深表赞誉之同时,他亦从文字学角度为朱希祖之驳斥提供补充证据,并慨言“学术贵自抒,不取依傍门户,以彼殊方旅人,津津言吾国古代史迹,其谬误在所不免,吾人岂宜随声附和”^④。1923年,顾颉刚在与王钟麒合编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对有关华族之来源的诸说如是评论道,无论是“东来说”还是“西来说”,“都不免牵强附会。东来说取材于不可凭信的讖纬传说,更不可靠。西来说较为近情,然也不能必验”^⑤。1925年,缪凤林在《中国民族西来辨》一文中对信奉“西来说”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诸家所称东迁(夏族东迁)证据,其不根大率类是,缘彼等本无真知灼见,能于载籍中发见西来之迹,从事立说,乃先认西来说为天经地义,因捕风捉影,任情附会,书之是否足据,言之是否衷理,皆所不顾,惟求其能完满其论。卒之毫无佐证之谈,言之凿凿,宛若实事,一般人见其然也,益奉其说为不磨,所谓吠影吠声者非耶。”^⑥1929年,何炳松则将域外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诸说斥之为“新神话”,称:“彼西洋学者欲藉一部分之文字再辅以文学上之神思以谋解决此种困难之历史问题,则其结果之劳而无功博而寡要,盖亦计中事”,其所提出的各种中国文明外来说“皆属想入非非之原理,吾人应视为无根之说而摈弃之”^⑦。

彼时的学人还对那些曾著述认同拉克伯里“西来说”者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缪凤林即如

是批评道:“中土学者于此新说之来,复不能审思明辨,或阙疑慎言,惟知巧为附会,助之张目,甚且并巴比伦史亦不知研究,徒拾彼等所说之一二以相矜夸,奉西戎为宗国,诬先民而不恤,今观此,其亦足以扞其舌欤。”^⑧在柳诒徵看来,拉克伯里之说“羌无确证,不足成为信谏也”^⑨,然令其不解的是,国内学人对此“穿凿附会之说”却“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他以丁谦的《中国人种从来考》为例,谓丁谦在书中称“西史谓徙中国者为巴克民族,巴克乃盘古转音。中国人谓盘古氏开辟天地,未免失实,而盘古氏之为中国始迁祖,则固确有可考矣”。据此,他不无嘲讽道:“此等荒诞之说,丁氏亦知失实,然犹信盘古为中国始迁祖,则傅会之过也。”^⑩何炳松对于国内学人附会拉克伯里“西来说”的批评,则更为尖锐。他认为,“西人之热心吾国古史者颇欲凭博言学或考古学上之方法以谋解决吾华民族起源之问题。一时众说纷纭,是非各执。终以材料不足,探讨未深之故,所得结果非属武断妄言,即同梦中呓语”。对此,国内学人“每每不分皂白,活剥生吞”,以至“堕入此辈学术界‘帝国主义者’之玄中而不自觉”^⑪。

五四之后的学人之所以对凭藉文字学方法考证中国文明起源之说由“翕然赞同,初无异词”转为全然否定,疑古之风的兴起是其原因所在。在科学思潮的洗礼下,怀疑和批判精神渐成中国古史研究的主流。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三皇五帝及记述此类神

① 《宋教仁日记》,1906年12月29日,载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702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载《饮冰室文集》(点校本),吴松等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页。

③ 朱希祖:《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3年第1卷。

④ 陈钟凡:《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起原考》,《国学丛刊》第1卷第2期,1923年。

⑤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胡适校订,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9页。

⑥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1925年第37期。

⑦ 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年。

⑧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1925年第37期。

⑨ 柳诒徵:《自立与他立》,《学衡》1925年第43期。

⑩ 柳诒徵:《述学:中国文化史》,《学衡》1925年第46期。

⑪ 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年。

话传说之古书的真伪开始产生怀疑。由此,以盲信古书为据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为当时学人所唾弃。缪凤林即谓:“考昆仑之有黄帝遗迹,见于《山海经》、《穆天子传》、《庄子》、《列子》、《新语》。……是诸书皆后人伪作(《庄子》虽不伪,《天地》篇疑伪。)。其所称述,要属史公所谓荐绅先生难言之类,固未足据为典要。”^①吕思勉在反思自己误信“西来说”之原因时亦言道:“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自谓所据,皆为雅言。由今思之,河出昆仑墟,盖古代谬悠之说。……夫民族缘起,必远在有史之前,而诸说皆以故书为据,且多不可信据之书,其无足采,不俟言矣。”^②在何炳松看来,仅通过文字、语言的比较无法考知中国文化之起源,因为“中华民族之起源问题本属未有文字以前之历史上问题”,“吾人既无考古学上之发见为推理之根据,则无论何种学说均属可能;而同时亦无论何种学说均属臆测。盖不从实质着手,徒作文字工夫,所谓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也,虽立论极其动人,亦于史学奚裨乎?”^③

由此,“增进我们对古代中国了解的唯一希望,就在于铁铲”,成为当时中国学人的共识。陆懋德即言:“欲考其文化之真相,必上溯人种来源之始,石器时代之初,文字未兴之前。凡此各种问题……而其材料,则不仅凭文字之记载,须有赖地下之发掘。”^④何炳松亦言:“假使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不举,则吾国民族起源之问题即将永无解决之期,而吾人亦唯有自安愚鲁之一法。”^⑤正因为如此,拉克伯里之说于20世纪30年代渐趋消歇,诚如齐思和所说,皆“附会穿凿,所论毫无科学上之价值可言”^⑥。陈登原亦谓:“西来南来之说,就文字以证明民族来自者,当无以免于捕风捉影之嘲也。”^⑦

二、中国文明之新“西来说” 在民国知识界的回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渐兴,域外学人陆续到中国进行探险和考古调查^⑧,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即由语言文字学拓展到“考古学”。劳费尔就多次到中国探险调查,收集陶器、玉器及汉代陶俑等古代遗物。基于对所收集古物的考辨与分析,劳费尔认为:“往时中国境内,似亦非无用石器者。然与其谓出于中国人之手,毋宁谓为出于异族人

之手之为当也;而此异族人固尝生息长养于中国者,故仅谓为中国之石器犹可,谓为今中国人之石器则不可也。”^⑨日本学人鸟居龙藏亦先后多次到中国辽东、辽南等地进行考古调查,他同样通过对在该地区采集的石器、陶片的分析,认为其均“非华人旧物”,而是“现居蒙古人先祖之遗物”^⑩。在以考古学方法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域外学人中,安特生基于仰韶等地的考古挖掘所提出的中国文化起源说最为民国学人所关注,其在民国知识界的影响亦最深巨。

1914年,安特生应北洋政府的邀请来到中国,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和煤矿。不过,得益于广阔的学术视野,安氏亦注意石器的搜寻,于1920年发表《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此后,中国史前文化成为他的兴趣所在。1921年,安特生开始在河南仰韶进行考古发掘。根据仰韶发掘所得,他于1923年发表题为《中华远古之文化》的考古学报告。在讨论“仰韶文化与古代外国文化之关系”时,安氏通过比较仰韶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纹饰后认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等着采之陶器,当由西来,非由东去也”^⑪。为进一步验证其仰韶彩陶源于西方的假设,他又于1923—1924年间亲赴甘肃进行考古调查。基于考察,安氏认为此种文化之发源地,非于新疆详加研究,不能判定。但就河南采集所得,颇觉此种文化之行程,实可由中亚细

①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1925年第37期。

②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版,第17页。

③ 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年。

④ 陆懋德:《中国文化史》,《学衡》1925年第41期。

⑤ 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年。

⑥ 齐思和:《评马斯波罗中国上古史》,《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1935年。

⑦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上册,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72页。

⑧ 有关外国人在中国的探险和考古,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一书。

⑨ Berthold Laufer,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 10, 1912. 译文引自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2号,1927年。

⑩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译,《地质汇报》第5号,1923年。

⑪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译,《地质汇报》第5号,1923年。

亚经南山及北山间之孔道东南而达于黄河河谷,以至现代甘肃之兰州^①。与拉克伯里之说不同,安特生是以最新考古学成果论证中国文明自西而来,故其说被民国学人称之为“新西来说”。其阐述考古挖掘及其阐释之著述,如《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国北部之新生界》《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及《甘肃考古记》^②等,一经译出即为民国学人所普遍关注,凡讨论中国之史前史,几乎无不提及著述,甚至马克思主义史家在讨论中国原始社会时,亦同样多有提及^③。

对于安氏的考古挖掘,李济以“功过参半”加以评价,认为“他的方法还不精密,非科学者最成功的方法”^④,但其他民国学人则多有肯定与赞赏。1922年4月1日,胡适在日记中如是写道:“安君是地质学者,他的方法很精密,他的断案也很慎重,又得袁复礼君的帮助,故成绩很好。”^⑤诒荪则就安氏考古挖掘之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意义予以高度肯定,认为:“中国远古的历史记载,除一些荒谬妄诞的神话外,绝无可考,这些的发掘,实为我国石器时代的文化第一次的真确发现,将来有益于中国远古文化的说明,更非浅鲜了。”^⑥卢绍稷亦谓:“是则吾国石器时代文化之真确发现,实始于此;进而考研,必且有益于中国远古文化之说明。”^⑦傅斯年虽批评安氏的考古挖掘工作存在不能利用中国的材料;走马看花,不能充分的考验;粗心挖掘,随便毁坏;如掘不得,即随便购买等可议之点,但仍高度评价安特生的考古方法“确实是比中国人有进步,所得的有趣味的材料,亦为不少”,称其对于考古的功劳,“着实不小”^⑧。

对于安特生所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以李济、梁思永、徐中舒等为代表的考古学界则颇表怀疑,他们力图通过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考古挖掘以驳斥其说或找寻怀疑之证据。1926年冬,李济和袁复礼前往山西考察古迹,发现夏县西阴村的史前遗址后即组织考古挖掘^⑨。李济就挖掘这一史前遗址之动机这样言道:“这文化的来源(指中国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安特生在他的各种报告中对于这两点已有相当的讨论。他所设的解释,好多还没有切实的证据。……我们现在的需要,不是那贯串一切无味的发挥;我们的急需是要把这问题的各方面,面面都作一个专题的研究。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

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基于西阴村的史前遗存,李济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⑩1929年11月8日,李济在中山大学讲演时对安氏所提出的“带彩者为自西方,不带彩者为原有的”再次详加驳斥。李济认为:“它们的土质都相似,带彩与不带彩并没有这样大的区分。”他引述亨利·法兰克福(Henri Frankfort)的观点称,“带彩陶器并不来自一源”,“怀疑仰韶彩陶与 Anau 没有关系。所以现在仰韶期已不可靠,安特生的结论根本动摇”,并特别强调:“中国带彩与不带彩的有密切关系。以经验而论,如带彩色的来自西方,则彩色细致的陶器应当在来源先及的地方,但事实上恰反,愈西愈粗,仰韶的精细,甘肃的粗。所以带彩陶器来源不能不怀疑了。个人研究所得,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这在山西南部有十几处。”^⑪1928年,梁思永

- ① 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乐森瑛译,《地质专报》甲种第5号,1925年。
- ② 袁复礼译:《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5号,1923年)、《中国北部之新生界》(《地质专报》甲种第3号,1923年)、《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古生物志》丁种第1号,1923年);乐森瑛译:《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5号,1925年)。
- ③ 如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吴泽:《中国原始社会史》,桂林文化供应社1943年版;尹达:《中国原始社会》,作者出版社1943年版等。
- ④ 李济讲、余永梁笔述:《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5卷第57、58期,1929年。
- ⑤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第489页。
- ⑥ 诒荪:《晚近中国史学界之一瞥》,《桐声》第2卷第1期,1926年,转引自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
- ⑦ 卢绍稷:《现代中国史学之发达》,载《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转引自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9页。
- ⑧ 傅斯年讲、王培棠记:《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杂志》1930年第1期。
- ⑨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欢迎李济、袁复礼自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的茶话会。是日夜,梁启超参加完茶话会后,给身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次子梁思永写信,如是言道:“(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12~713页)
- ⑩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载《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142页。
- ⑪ 李济讲、余永梁笔述:《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5卷第57、58期,1929年。

在其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亦对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表示存疑,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的发祥地及其与安诺报告中所载彩陶间明显关系的真实意义迄今仍不易解决。”^①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对安特生依据阿尔纳(T. J. Arne)意见推算仰韶时代约在公元前三千年的观点持有相当的怀疑,认为“此种推断可信的程度也很薄弱”。与此同时,他从交通史视角就仰韶与苏萨、安诺两地间彩陶的关系提出具有说服力的疑问,“纵使苏萨、安诺与仰韶有若何显著的关连,我们只看有记载以来的交通,从小亚细亚传播到黄河流域,也须要相当的时日,何况这两方的关系,我们还无从明瞭呢?”另外,他还结合文献资料力证:“仰韶与小屯为两种不同的,各自发展的文化”“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大月氏、大夏为虞夏民族西徙后的名称”,藉此否定安特生的新西来说,并推断“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②。

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新史家,对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同样多表质疑。胡适在1922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虽称安特生的“立论甚谨慎,很可佩服”^③,但对于仰韶文化西来说,胡适则明确表示反对。他在1923年4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袁君与安特森皆以为古代陶器之有色泽花样的,是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我颇不以为然。我以为,与其用互相影响说,不如用平行发展说。前说可以解释那相似的花样与相同的用轮作陶器之法,而终不能解释那中国独有之空脚高。后说则既可以用‘有限可能’之理说明偶合,又可以用独有之样式为其佐证。”^④缪凤林则谓:“西亚民族之历史较中国民族为后。由年代种族文化及地理上之阻碍等考察,西来之说为事理所必无。中国民族即自外来,亦必不自巴比伦迁入。”^⑤对于“安氏等所自立说”,金兆梓“为正其曲解”,特撰《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一文。他在文中质疑道:“若彩色陶器而果自西东来,则首受其影响者,当属甘肃,何以略先于仰韶期之齐家期,竟未之见?乃竟同发见于仰韶。即果如安特生氏所谓传播甚速,何以河南之彩陶,无论质地、制法、图案、设色,又在在胜于甘肃也?果吾人亦如安氏之以独断的论证,根据河南之鼎鬲既早于甘肃,谓其由西而东传,河南之彩陶,论质而不论量,又在在有胜于甘肃,因

更谓就陶器论,实为中国文化之西行。可乎,不可也?”在金兆梓看来,“在彼可证为由西而东,在我亦可以之证明由东而西”。金兆梓感慨称“西人之好包办世界文明也!”^⑥1934年,傅斯年在《城子崖序》中对安氏之说同样提出强烈质疑与批判:“在中国遍求于中央及西方亚细亚彩色陶器有亲属关系之中国采色陶器之分布,诚然是一件绝重大的考古工作。然中国史前及史原时代之考古,不只是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若以这个问题为第一重心,则仿佛觉得先秦二三千年来中土文化之步步进展,只是西方亚洲文化之波浪所及,此土自身若不成一个分子。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已使我们坚信事实并不是如此的。……总而言之,西洋人作中国考古学,犹之乎他们作中国史学之一般,总是多注重在外缘的关系,每忽略于内层的纲领,这也是环境与凭藉使然。”^⑦

陈恭禄曾就安特生之说这样评价道:“虽或为人所指摘,推论并为人所怀疑,然其于学术上之有贡献,则为不可否认之事实。”^⑧如其所言,安氏的考古挖掘及其所做出的推论,民国知识界虽有所指摘和质疑,但其学术影响深巨。有学人即谓:“一般人总以为中国民族与文化源于中央亚细亚,或者在中国的西北部,由此而定中国民族及中国文化发展之路线,为由西北而东南。其实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至于所以造成此绝大错误的原因,主要者就是安特生、阿尔纳、步达生等人所创的‘彩陶分布说’。”^⑨事实确乎如此,安氏之说在民国知识界中有相当的认同和支持者。1924年,吕思勉在《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一章《汉族之由来》中开篇即言汉

① 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页。

②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第3期。

③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卷,第548页。

④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卷,第3页。

⑤ 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1925年第37期。

⑥ 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东方杂志》第26卷第24号,1929年。

⑦ 傅斯年:《城子崖序》,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2页。

⑧ 陈恭禄:《中国通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⑨ 荆三林:《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新中华》第6卷第7期,1948年。

族始迁自今中亚西亚高原,进入黄河上游之昆仑,其后,再沿新疆至甘肃之路径,徙入中国本部^①。章鸿钊在《石雅》一书中即谓,安特生和阿尔纳所言着色陶器自中亚输入黄河流域,而取道于甘肃北山南山之间经兰州而下,“固可信也”,并谓“综览先后考古所获,虽民族所自,远未能详,而文化肇兴,秩然可纪,即如安特生氏所述甘肃文化各期均云中国有史前后不远者,斯言固大略可信也”^②。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自序中言道:“瑞典人安特生近查河南渑池仰韶村出土古器之器工花纹,与意大利西西利岛及希腊北部启罗尼波兰国格雷西亚、俄国西南基辅城附近脱里波留、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Anau)等地所发见者极相似,令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两地艺术,彼此流传也,河南距安诺道里极远,然两地之间,实不乏交通孔道。”^③曾友松则根据“中央亚细亚为人种起源之圣地”,主张“汉族之由中亚迁入更是无疑”;他还引安特生的“考古学上的证据”,认为“只要我们略为考究器物之形式及陶器之色彩”,尤其是“河南与安诺所采掘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便可证明“中国的文化无疑是和中亚发生一个最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新疆是一个中亚与远东文化交通的孔道”,中国文化“是直接或间接从中亚文化区域分播去的”^④。

甚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民国知识界仍不乏持安氏之说的学人。赵心人在讨论“古代民族的迁徙”时即称:“历史开始以前,现世各主要民族的祖先,大概都聚居于中亚草原上,其后因分散至各处,受了各该地的影响,遂形成不同的民族与文化。那些人民向东越葱岭而迁至黄河流域的是中国民族。”^⑤陈安仁亦以安氏考古及推论为据,认为“新石器时代的新疆,是一个中亚与远东文化交通的孔道,因为古代的新疆没有如现在的沙漠连绵,同时山岭亦不能阻止两处民族的接触,所以甘肃、河南一带的文化,皆和中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言“人类起源的地方如确定是在中亚细亚,中国民族与文化的来源,依据于中亚细亚,亦较有可凭的地方”^⑥。

然而,如果说此前民国知识界对安特生之说还存在认同、接受或质疑乃至否定之分歧,那么到20世纪30年代末之后,质疑与批判则已成为普遍之势。考古学家们对安氏之说尤其是其“六期说”提出强烈之质疑。1938年,吴金鼎在其博士论文《中国

史前陶器》中从陶器特征出发,认为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分期之划分显系错误,提出齐家文化可能是一支独立的地方文化^⑦。1943年,尹达在《中国原始社会》一书中称,“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遗址,还不能即刻得到解答。现有材料告诉我们,它晚于仰韶村遗址的可能性比较大些,早于仰韶村遗址的可能性比较小。安特生的推测正是可能性比较小的一方面”,并认为安特生的错误是“由于不曾仔细分析遗物和其堆积的关系,混淆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所以在分期问题上就犯了相当大的错误”^⑧。1947年,裴文中在对齐家坪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后亦认为:“安特生氏谓齐家坪之产物,代表彩陶文化系统最早之一期,在仰韶时期之前。吾人此次由地层及所采陶器之观察,皆不能证明之。若再参考吾人在他处之观察,则吾人暂时认为,居住和埋藏于齐家坪之人类,除辛店期者外,似为另一民族,有不同之另一种文化,名之为‘齐家文化’,与彩陶文化为不同之系统。”^⑨夏鼐持有与裴氏相似之观点:“从陶器方面来研究,齐家陶与仰韶陶是属于两个系统,我们不能说齐家陶是由仰韶陶演化而来,也不能说仰韶陶是由齐家陶演化而来”^⑩。

不唯考古学家如此,此时其他民国学人亦同样有所质疑,以至彻底否定和批判。曾认同并接受安氏之说的吕思勉即言:“夫文化果自西来,则必愈东而愈薄。甘肃陶器,安特生固谓其采色、图案,皆胜河南,然又谓陶质之薄而坚,及其设色琢磨,皆在河南之下,因此不敢坚执二者之相同,则谓其来自西

① 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载《吕思勉全集》第20卷,第16页。

② 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2号,1927年。

③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11页。

④ 曾友松:《中国原始社会之探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8、62~63、69页。

⑤ 赵心人:《初中新外国史》(上),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67、68页。

⑥ 陈安仁:《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7、29页。

⑦ Wu Ghin-ting, *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 London: Trubner, 1938, p. 50.

⑧ 尹达:《中国原始社会》,第36页。

⑨ 裴文中:《甘肃考古报告》,载《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236页。

⑩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之改订》,《中国考古学报》第3册,1948年。

方,似无确据。又中国文化,苟与西方关系甚深,则种族之间,亦必有关系,何以仰韶村、沙锅屯人骨,步达生又谓与今华北人相同乎?然则新西来说,似亦未足据也。”^①在吴泽看来,“因为甘肃出土的彩色陶器和在波斯萨苏出土的彩色陶器极其相似,所以安特生就说,原始的中国民族原来是住在土耳其斯坦地方,接受西方文化,后来向西域甘肃一带移动,最后才迁到河南等地,这也是胡说。我们知道一个民族和另外一个民族发生交通关系,固可相互模仿,互相影响其文化,反之,纵令这民族不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影响,也有完全独立产生出某一定的文化的可能”^②。荆三林则先后撰有《从秦王寨出土着色陶器上对安特生及阿恩之质疑》《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等文,在批驳安氏之说存在谬误和矛盾之同时,提出中国文化西行之论,认为“如以彼所找之材料而论”,恰可证明“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经甘肃之兰州,沿黄河河谷西行,经南北两山之间而至中央亚细亚,西方人受东方人或东方文化之影响,而向西移动,由西亚而至欧洲”。他颇为自信地称“此说至为合理,且证据比较确实”^③。吕振羽不仅对安氏之说提出质疑,更对安氏颇为尖锐地批判道:“安君对中国考古工作上的努力和贡献,我自然对他表示相当的敬意,但对他这种故弄玄虚的勾当,也不能不提出抗议。易言之,安君是从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上来研究中国文化的,在他看来,只有成了帝国主义的白种各民族,才有着创造文化的能力,在他看来,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国民族是劣种民族,自己并没有创造文化的能力。这就是安君的‘西来’说的隐衷。”^④到20世纪40年代初,安氏的中国文化新西来说可以说已基本上为知识界所抛弃。1943年,安特生自己在其著作中这样反省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道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的影下,谈到把一种什么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时,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⑤

三、中国文明之“渗入说” 在民国知识界的回响

193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者相继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等地组织考古发掘,出土了中国以外地区所不存在的史前时代之遗物,这昭示

着中国存在着一个不同于以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古老文化^⑥。由此,域外学者逐渐放弃了纯粹的“西来说”,转而多采“渗入说”或“影响说”,即认为中国固然有起源于本土的文明,但推动其文明发展的根本性或基础性要素则多系西来或受到西方文明之影响^⑦。美国考古学家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即将中国文化称为“渗入型文明”。基于对牛、羊、马、鸡、水牛、骆驼、小米、高粱、大麦以及彩陶、穴居、复弓、青铜器、战车、文字等的考察,他认为“没有外方文化的帮助,中国的文化无论如何是不能发展的”,因为“作为文化基础的家畜及能产生食物的植物”,主要来自近东和印度^⑧。由此,他得出结论: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⑨。在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看来,“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而“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在彼时中国文明起源争论中,对于彩陶与青铜这两个最为显要的元素,他均认为系外来,以此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⑩。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域外学界,中国文明起源之“渗入说”几成公认之说。以美国学界为例,不论是专门性著作还是通识性著作均采此说。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在探讨中国早期文明之起源时,虽

① 吕思勉:《先秦史》,第19页。

② 吴泽:《中国原始社会史》,第19页。

③ 荆三林:《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新中华》第6卷第7期,1948年。

④ 吕振羽:《中国原始社会史》,上海耕耘出版社1943年版,第179页。

⑤ J. G. Anderson,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43 (15).

⑥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第170页。

⑦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4页。

⑧ Carl Whiting Bishop, “The Beginnings of North and South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1934(3). 译文转引自毕士博《中国南北文化的起源》,黄泽浦译,《集美周刊》第18卷第2期,1935年9月30日。

⑨ Carl Whiting Bishop,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Eastern Asia*,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39. 译文转引自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36页。

⑩ 滨田耕作:《东亚文明之黎明》,张我军译,《辅仁杂志》第2卷第2期,1931年。

认为“新石器时代伊始,中国东北地区已存在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因为“在这个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在商代文化中也存在,而在欧洲或近东却不能发现的制品”,但他亦承认“青铜铸造可能不是中国发明的,而是从西方的某个地方引入进来的”,并就中国文化之特性如是言道:“和所有伟大的文化一样,是兼收并蓄的,孕育于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但当这些影响和技术被接受时,它们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即根据中国国情而被加以吸收和发展,并转化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富路德(Luther C. Goodrich)在《中华民族简史》中援采毕士博之观点,认为中国有其土生的文明,但“完全不提及遥远的西方渊源”亦非正确,牛拉犁、狮子、棺木、护城河、矿井、骡、驴和骆驼等显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②。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其出版于1948年的成名作《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亦采毕氏之说,直言:“中国有早期的土著文化,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也从近东通过中亚路线进入中国。……中国的本土文化似乎是从西北部不断注入的接收者。”^③美籍德裔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也持相似观点,认为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要素主要是原始通古斯的中国北部文化、原始土耳其的中国西北文化、原始西藏的西部文化以及三个南部文化,这几种文化之间“并非只发生一种混合,乃是他们彼此的补益,彼此的施与”^④。

这些以“影响”或“渗入”解释中国文明起源之说,亦为民国知识界所关注。毕士博的《中国文化之初源及其地理背景》一文1932年发表,次年即被译为中文,译者朱炳海谓“著者之臆说,为吾国史学专家所不能赞同者当属不少,惟其方法颇有可采,故介绍之,以供有志研究上古历史地理者之借镜”^⑤。1934年10月17日,夏鼐读完毕氏刊于《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上的《中国南北文化的起源》后,在日记中感慨道:“毕士博此文虽仅寥寥20余页,颇耐深思。”^⑥此文中译文于次年刊出,译者黄泽浦特别强调:“本文作者毕士博氏,为一有名之美国中国史学家,曾到我国作考古工作多年。本篇为其研究我国文化起源之总结论。从本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外人研究我国古史之态度如何。故颇足为研究中国古史者参考,也可帮助一般学生明了中国文化起源的状态。”^⑦对于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民国学人于式选这样评价道:“先生学问淹博,持论纯

正,凡谈有关中国之问题,向系鉴空衡平,忠实论究,绝不似喜田贞吉、矢野仁一、鸟居龙藏等之御用学者,负有政治使命,故为曲解事实,代野心家作凌辱中国之‘学术的根据’也。”^⑧故此,其著述在中国知识界有着更为广泛的流布,不仅考古学方面的诸多著述相继被译成中文^⑨,其《东亚文明之黎明》甚至出现张我军、徐翔穆、汪馥泉、杨炼等四个译本^⑩。1935年9月23日《早报》对杨炼的译本进行专门推介:“这本书是研究东亚古代的著作,对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都有精到的认证。对于东亚的人种亦有独特的见解处,实在增加我们古代智识的一本简明、正确的书籍!”^⑪顾立雅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中国文明之诞生》,则有雷海宗撰著书评予以评介^⑫。卫德明曾于1941年至1942年在北京为其同胞做有关中国历史演讲多达十次,其中第一次讲演

- ① Herrlee G. Creel,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38, pp. 253—254.
- ② Luther C. Good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3, pp. 10—19.
- ③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 25—27.
- ④ 卫德明:《中国之史前史与原始史》,杨丙辰译,《国民杂志》第3卷第6期,1943年。
- ⑤ C. W. Bishop,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Its Geographical Aspects”, *Geographical Review*, 1932(4). 译文参见蜀萧普《中国文化之初源及其地理背景》,朱炳海译,《方志月刊》第6卷第2期,1933年。
- ⑥ 《夏鼐日记》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 ⑦ 毕士博:《中国南北文化的起源》,黄泽浦译,《集美周刊》第18卷第2期,1935年9月30日。
- ⑧ 于式选:《介绍日本考古学者》,《考古社刊》第6期,1937年11月。
- ⑨ 滨田耕作被译为中文的著述有:《鼎与鬲(附图)》(闻宥译,《东方杂志》第26卷第3号,1929年)、《中国古代文化鸟瞰》(汪馥泉译,《青年界》第1卷第5期,1931年)、《考古学通论》(俞剑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古玉概说》(胡肇椿译,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古物研究》(杨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
- ⑩ 这四种译本分别为:《东亚文明之黎明》,张我军译,《辅仁学志》第2卷第2期,1931年;《东亚文明之黎明》,徐翔穆译,神州国光社1934年版;《东亚文化之黎明》,汪馥泉译,黎明书局1932年版;《东亚文明的曙光》,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 ⑪ 《书报介绍:史地小丛书之东亚文明的曙光》,《早报》1935年9月23日。
- ⑫ H. T. Lei, “Book Review, The Birth of China by Herrlee G. Creel”,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37(2).

系《中国之史前史与原始史》。民国学人杨丙辰“以其第一次所讲,颇有异我国学者见解不同之处,因特译出”^①。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借历史文化激发民族精神和爱国之心,成为彼时民国知识人的主要取向。1934年,李济即提出:“我们若要发扬民族主义,对于民族的历史绝对的不能漠视”,并强调:“要发扬这个主义,除了历史的训练,又有什么别的方法呢?”^②傅斯年亦曾这样言道:“本国史之教育的价值,本来一大部分在启发民族意识上。”在他看来,“当前的课题,只在用何方法使历史教育有效的、有益的启发民族思想”^③。钱穆在成书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国史大纲》之开篇,即向读者提出对待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意在藉历史激励国人之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使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识,其要在此”^④。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学教科书编辑兼教科书审查委员姜季辛在审阅了各大书局所出版的九种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更是直言:“有些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依旧含混其辞,不说‘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存疑’,便公然仍旧主张‘西来说’。”在他看来,这将间接“动摇国民对于‘保卫领土,爱护祖国’的决心”。他认为:“今日编著历史,应着眼于全民族共同的‘民族意识’。”^⑤

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之本土说成为当时学界的主流议题。缪凤林即在《本国史》中明确指出,今日国人之祖先有史以前便已生息于东亚,“有史以来之民族绝无外来之可能”,无论种族与文化均为祖先自创^⑥。金兆梓的《高中本国史》(上册)、杨东莼的《高中本国史》、白进彩的《高中本国史》、陈登原的《高中本国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中国通史类教材与缪凤林之书观点基本相一致,均持本土起源说,并通过详细梳理中国考古学之成果对外来说大加驳斥^⑦。陈登原更是倡言,中国文化在世界可谓“开创之早也”;其在亚东之地位,“盖为亚洲文化之祖先”,并“尝有所启迪异族,煦育外国也”^⑧。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文明本土说更是成为不容置疑之说,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家

皆持此说。郭斌佳强调:“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它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从野蛮走向文明。”^⑨马克思主义史家尹达亦言:“中国社会不是孤立的东西,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受到外来民族的影响,民族的混合,以及民族文化的交流都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基本上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来源有其独立和自别的特点。欧美和日本的学者为着他们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证明‘中华民族和其文化是从他处移植过来的’这种谬论已经被事实击得粉碎了。”^⑩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东方杂志》1937年第7号特别推出“中国文化问题特辑”^⑪。贾丰臻认为:“说到文化问题,那个不知道世界各国中文的起原和发达,要算中国为最早了。”^⑫李长傅在对外来说大加驳斥后,强调:“谓其受外来文化一部分之影响,容或有之,若以其遗物之一端,遂附

① 卫德明:《中国之史前史与原始史》,杨丙辰译,《国民杂志》第3卷第6期,1943年。

②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3月。

③ 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

④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3页。

⑤ 姜季辛:《略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缺点》,《教育通讯》第2卷第16期,1939年。

⑥ 缪凤林:《本国史》,南京钟山书局1932年版,第32~34页。

⑦ 金兆梓:《高中本国史》上册,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5页;杨东莼:《高中本国史》,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第26页;白进彩:《高中本国史》,文化学社1935年版,第18页;陈登原:《高中本国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28页;钱穆:《国史大纲》,国立编译馆1940年版,第4页。

⑧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上册,第58页。

⑨ P. C. Kuo, “Folkways in Prehistoric China”, *T'ien Hsia Monthly*, 1937(2).

⑩ 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1940年。

⑪ 此特辑刊载了11篇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文章,具体为:杨幼炯《我国政党政治之蜕变及其对于近代文化之影响》、曾仰丰《中国盐政之动向》、李伊《中算之起源及其发达》、陈顾远《中国婚姻制度之发生并其进展》、陈邦贤《中国医学之起源及其发达之状况》、冯承钧《中国南洋之交通》、卫聚贤《中国文化起原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贾丰臻《中国文化的起原和发达》、李长傅《中国文化起原与世界文化移动之研究》、林惠祥《中国文化之起源及发达》、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其中讨论中国文化起源的文章,无一例外都强调中国文明的本源性。

⑫ 贾丰臻:《中国文化的起原和发达》,《东方杂志》第34卷第7号,1937年。

会其文化自外移动而来,此在科学上历史上立场上,决对不容许者也。”^①卫聚贤则认为,殷为本土之苗民,其文化是独立起源,“中国的文化以殷人的文化为最高,而且由殷人传播于夏周,但殷人是由东南向西北的,故余以为中国的文化起原于东南而发达于西北”^②。曾盛赞安特生的“方法甚精,推论应有一部分可信”的林惠祥认为,作为中国文化之基本势力的华夏文化“似以本土说为近似也”^③。谓“中国之文化,一部分由西而来,似无可否认”的王云五亦言,“然中国人类有独自创造之文化,后且传播于东西辽远之地域,则更属可信也”^④。

由于饱受欺凌,文化民族主义成为此时中国知识界的主导性思潮。即使是被左派指责为“醉心于欧化”的学人,亦对中国文化“渗入说”大加质疑与批判。胡适即依据平行发展之理论批评富路德,“在对待如此遥远过去的文化对象时,经常犯有过于倾向‘文化借用’理论而甚少承认文化‘独立或平行发展’的错误”。在他看来,“归因于文化借用似乎牵强附会,而且也并非历史事实”,因为“面对类似的需要和困惑,人类心灵通常能够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发明了或多或少相类似的解决方法”^⑤。雷海宗在评述顾里雅《中国文明之诞生》时,对作者的“青铜铸造的关键技术可能起源于西方”这一观点进行批驳,认为作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仍旧处于进化论的教条主义者的影响之下”,“尽管没有任何文化特征可以被证明是从蓝色天空中掉下来的,然而,突变不仅在生物学上,而且在文明史上都是不争的事实。古代埃及人的防腐技术和中世纪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都是失传艺术,这些艺术似乎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完美”^⑥。李济虽不否认“今日或过去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由于文化接触的结果”,但认为“在应用此种理论于某一特殊文明之前,我们必须不惜余力搜集资料来详细考察文明实际成长中的每一个细节”^⑦。故此,他特别致力于“揭破西来说中包含的无根据臆测”^⑧。在讨论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李济即直言批驳毕士博的观点,认为至少就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来看,“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⑨。

饶有意味的是,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疑古时代亦让位于复古时代。在讨论中国文明之起源时,文字史料和古代传统说法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似

乎又逐渐被恢复。王伯平在《再论中国民族起源问题》一文中就传说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指出:“固然有些传说是后人为了某种目的伪造的,完全为无稽之说。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有些传说是有真实的历史事实为其基础。所以,在历史研究上利用传说作某种论断的根据,不能说全能无用。”^⑩高潜子在探讨中国文化之起源时,认为“中国上古大事,信而有征者,为洪水之灾”。他依据《山海经》《系辞传》《尚书》等古书之记述,将上古洪水、伏羲造字、神农教民耕稼等神话传说皆视为信史^⑪。吴泽基于考古挖掘出土之遗物的考辨明确指出:“根据上述出土物所示的各种现象,再把古籍传说记载与之作严谨的联结的发展的相互范围的科学运用时,可知神话传说内容亦有部分的历史性,并非全属荒唐无稽。”他称:“就《史记》、《尚书》、《左传》等正史所列传说人物的次序,主要的几个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尧、舜、禹以及夏代。而附着于这些传说人物身上的神话传说,其发展规律与上述出土物几乎完全一致。”^⑫郭斌佳在《中国史前民俗》一文中则就此前所流行的疑古思潮进行了颇为尖锐的批评:“今天的中国历史学家不仅质疑某些文献的真实性,而且对古老的中国传统进行了全面的猛攻。这种事态是现代批判性学术最令人遗憾的滥用之一。虽然怀疑的精神在寻求真理时是很有用的,但过度的怀疑可能

① 李长傅:《中国文化起源与世界文化移动之研究》,《东方杂志》第34卷第7号,1937年。

② 卫聚贤:《中国文化起原于东南发达于西北的探讨》,《东方杂志》第34卷第7号,1937年。

③ 林惠祥:《中国文化之起源及发达》,《东方杂志》第34卷第7号,1937年。

④ 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东方杂志》第34卷第7号,1937年。

⑤ Hu Shih,“Book Revie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Pacific Affairs*,1944(2).

⑥ H. T. Lei,“Book Review: The Birth of China by Herrlee G. Creel”,*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37(2).

⑦ 李济:《中国早期文明》,第18页。

⑧ 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10页。

⑨ 转引自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37页。

⑩ 王伯平:《再论中国民族起源问题》,《前途杂志》第2卷第9期,1934年。

⑪ 高潜子:《中国文化之起源》,《中外文化》1937年第1期。

⑫ 吴泽:《中国原始社会史》,第7页。

会像轻信一样令人不快。”基于这一认识，郭斌佳根据古籍记载的神话传说详述用火、农耕、渔猎、家畜驯养、文字、钱币、衣服等都是燧人、伏羲、神农、黄帝这些中国圣贤豪杰所创造发明的。最后，他还特别强调这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是“我们种族”的创造天才的象征，我们不用怀疑古圣先贤的存在，最好还是对那些曾为中国文明的奠基付出过努力的人们抱持尊重之姿为好^①。

余论：文化认同危机下的回响及启示

五四之后的民国学界曾批评认同拉克伯里“西来说”的中国学人，认为其“惟知巧为附会”，以致落入“‘帝国主义者’之玄中而不自觉”^②。到20世纪30年代末之后，对于接受或一定程度认同中国文明外源说之学人的批评，则更趋严厉。荆三林即这样批评道：“固然安特生及阿恩等是自欺欺人，而我们无条件的崇拜外人，没有一点自信心，没一点自主的判断，便盲从外人，也不能不引为遗憾。”^③华白沙则如是指责李济、徐中舒等学者：“以本国学人研究本国史地文化，而要这样推崇英美人不成熟的见解，不但是无聊，而且是可耻的！”^④徐中舒在1950年的先秦史讲稿中就中国青铜器之源起进行解释时，曾就左翼学人的批评这样回应道：“中亚地区的铜器，比我们产生得早，这可能与中国铜器有关。要是历史事实是这样，我们肯定这一点，是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而加以丰富和发展的，这并不是非爱国主义的提法。”^⑤由前述考察亦可知，民国知识界对于域外中国文化外源说之质疑与驳斥呈渐趋强化和普遍之势。早在民初之际，知识界对于中国文明之起源，可谓“众说纷呈”，既有持本土说者，亦有众多学人赞同外来说；20世纪30年代后，域外之中国文明外来说虽仍不乏信奉者，但质疑与批判渐趋上升；全面抗战爆发后，即便是胡适、雷海宗、李济等自由派学人，在评述域外有关中华文明外来说之著述时，亦明显夹有浓厚的文化民族主义之情绪，更遑论马克思主义史家，本土说已成不容置疑的普遍之说。

民国知识界对域外之中国文明外来的认知及回应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嬗变，学术本身的发展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有学人曾就民国学人对于安特生之

说的回应指出，它们“总体上都不出学术范畴，而且往往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⑥。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谓事实之反映。民国学人之所以抛弃拉克伯里之说，转而关注乃至认同与接受安特生之说，既受彼时疑古思潮之兴起影响，更与考古学在中国的展开是分不开的。童书业曾言道：“史前文物的研究，这差不多是考古派专有的成绩。至彩陶和黑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尤使我们明白古代文化确有东西两系，而且受有外来的影响。”^⑦正是随着考古挖掘的推进，中国有其发端于本土的文明不断得到确证，本土说由此渐趋成为主流之说即属当然。林惠祥即言：“土著说初亦无确证，然近来华北一带史前遗址发现日多，铜器新石器时代之遗址最多，旧石器之遗址亦有之，甚至极古远之人类遗骸亦发现于北京附近，故土著说有逐渐得势之希望。”^⑧李济亦曾就民国知识界对于古史所记载的传说与神话由疑古转为信古这样分析道，很多以前被推翻的历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这些新发现鼓励中国人为他们民族历史的悠久而骄傲，也使国人对传统记载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⑨。由此可见，不仅是民国学人对于域外之中国文明外来说的回应，即便是疑古思潮逐渐为信古思潮所取代，亦与考古之发展存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① P. C. Kuo, "Folkways in Prehistoric China", *T'ien Hsia Monthly*, 1937(2).

② 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年。

③ 荆三林：《从秦王墓出土着色陶器上对安特生及阿恩之质疑》，《学术评论月报》（创刊号）1940年7月17日，载王星光主编《荆三林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8~9页。

④ 华白沙：《古史及古史研究者》，《杂志》第9卷第6期，1942年，转引自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430页。

⑤ 《徐中舒先秦史讲义（1950年讲稿）》，徐亮工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⑥ 具体探讨参见马思中、陈星灿《安特生在中国的命运：从学者到学者的回归》，载陈星灿《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周书灿《仰韶文化西来说的形成及论争——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等。

⑦ 童书业：《略论近年来国内史家史前史研究的成绩》，《光华年刊》1939年第14期，转引自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414页。

⑧ 林惠祥：《中国文化之起源及发达》，《东方杂志》第34卷第7号，1937年。

⑨ 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载《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下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第870页。

然而,我们不能将民国知识界对于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的回应及其所呈现出的嬗变仅归因于学术,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文化认同危机。张灏曾指出,1895年至1925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时代,身处转型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空前的文化取向危机,不仅传统的基本社会价值取向受到严重侵蚀,同时在文化认同上亦出现危机^①。确如其所说,自19世纪初叶与西方接触以来,中国人发现已置身于一个与华夏中国全然不同的新世界。面对一个以西方霸权为主导的新世界,中国人存在严重的文化失重感,其文化自信与自尊亦大受打击,因为中国学人曾一度自认为是天下之中心,现在却沦落为文化边缘与落后之国度。由此,拒斥域外之中国文明外源说,坚守文化之民族本位主义,即成为部分学人的选择,他们希望藉此找回应有的文化自信与自尊。陈嘉异即言,其所以撰著《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系驳斥“东方文明决无足与西方文明对等并称之理”的谬论,他在文中强调:“吾国文化实为独立的创造的文化,而与欧西文化其起源为传承的因袭的者实大有别”,此“已足成为对峙之二元而有余”^②。何炳松则将域外所出现的诸种中华民族外来说归结于西方人的自大,“西洋人自大轻人之心事并亦流露于学术研究之中,殊出吾辈崇拜西学者之意外,而各种新神话之兴起,此或即其主要之原因”^③。与此同时,中国学人深切认识到必须更新对新世界的认知地图,方能在这个新世界里寻找到文化自我定位。丁文江1931年发表《中华民族是如何获得其文明》一文,在强调中华文明之“渐进而持续发展”的同时,用相当之篇幅梳理中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外来的影响”,并据此申言唯有“最终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融入国际大家庭”方能寻找到“民族救赎”,“适应这种工业文明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唯一途径”^④。无论是源自情绪扭曲还是发自文化自我定位的认知需要,实质上都是文化认同需求在转型时代的普遍散布。正是这种文化认同需求,使得民国知识界面对中国文明外源说时,呈现的是多种声部的大合唱,或认同或怀疑或驳斥。

九一八事变之后,文化认同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王汎森即言:“面临外国的入侵,被侵略者开始寻找他们的民族精神。在一个反传统和西化盛极一时的时代,从民族危机中生发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是谁,我们的民族是什么?’^⑤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文化认同需求不再是多声部的大合唱,而是转换为只有一种声部的大合唱,强化民族认同以激发民族精神成为唯一之旨趣所在。保守派学者对西化及新文化运动后所兴盛的反传统大加批判,认为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失序,从长远看更招致日本的入侵^⑥。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武培干等十位教授更是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公开倡导文化本位主义^⑦。马克思主义史家同样持文化本位主义,主张中国文化本土说,并藉此增进民族认同,激励民族精神。尹达在1940年所发表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一文中,致力于论证“中华民族和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繁荣滋长起来的,并不是由他处移植过来的东西”,同时他还在文中特别强调这一问题是“当务之急”,因为“欧美以及日本的学者在过去和现在都竭力搜集证据,去证明中华民族和其文化不出于中国广大的领土之内……国内一部分醉心欧化的学者也曾盲目的附和了这种论调。在抗战的过程里,部分的准备投降妥协的顽固分子,很可能利用这样的论调一笔抹杀那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史迹”。因此,“为了增强民族自信心,为了使中华民族的子孙了解过去这光辉灿烂的史迹,为了反对‘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之无耻行动,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加以说明,我以为是必要的工作”^⑧。作为新史学之代表的顾颉刚,亦表现出明显的转向。顾颉刚早年曾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

①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46页。

② 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1921年。

③ 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26卷第2号,1929年。

④ 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7~408页。

⑤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0页。

⑥ 牟润孙:《学兼汉宋的余季豫(余嘉锡)先生》,载《海遗杂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3页,转引自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170页。

⑦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

⑧ 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1940年。

的中国古史”说,对中国古史传说大加质疑。九一八事变后,他则主要致力于边疆史和民族史研究,并于1939年发表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他如是写道:“‘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①源于紧迫之民族危机,增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成为时代的呼唤与现实之需要,中国文化本土说遂成为不容置喙之说。

众所周知,民国时期正是中国处于饱受欺凌和战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学术已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技艺,还寄托着民族精神。孟宪承即这样说道:“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在什么上面?一个民族的生存又是靠什么?当然,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在它的文化上,一个民族的生存要靠它的学术来孕育,就是说,一个民族的生存是要建筑在它的学术上面。”^②郑师许亦曾这样感慨道:“政治不及别人家,军事不及别人家,经济不如别人家,固然可耻到万分,然而一切的学术都比不上人家,都在水平线以下,连自己的先民所创造或记述下来的学术遗产,都研究得不及人家,这真是顾亭林所谓‘亡天下’之痛了。”^③在一个因民族危机而将民族精神寄寓于学术,并希望藉此捍卫民族自尊的时代环境里,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之关系相较于其他学术问题有着更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其直接关乎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之涵育。正因为如此,对于民国知识界在回应域外之中国文明外源说时所呈现出的浓烈之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今天的我们深可理解,这可谓是特殊时代环境使然。正如顾颉刚所言:“学术的方面,也因时势的需求而促成思想的转变,于时代的背景关系最切。”^④

时下,出于增进国人文化自信之旨趣,力证中华文化之于域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影响正成为潮流,甚至有人倡言西方文化之源头在东方和中国。对此,我们则不能不加以必要的警惕与警醒。劳费尔曾言:“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被排斥或被孤立的,也没有一种文化完全由自身内部因素推动而纯粹内部发展。文化的成长和传播是历史因素造成的,必须结合人类的普遍历史来理解。任何历史问题都不可能仅通过将关注点限定于一个特定的文化领域而排除所有其他文化领域以获得理解 and 解决。”^⑤劳费尔一百多年前的所言,对于今天的我们仍不乏启迪意义。以今日之考古证据,当然有理由

坚信中华文明之主体源出于本土,但认为中国文化完全系“自本自根”,由中国人自己所独创,则如说中国文化完全来自西方一样,都是“毫无根据的话”。事实上,言中华文明受其他文明之影响,并不有损于文化自信,相反更有利于强化和增进我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自信。诚如李济所言,我们既应竭力打破西来说中所包含的无根据臆测,亦应反对“本土论”者当中的某些狭隘地域观念,认识到中国文化能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并加以消化融合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长处^⑥。

陈寅恪曾就外来所输入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之关系这样言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并强调此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⑦。今天的中国正在向世界舞台中心迈进,在对待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之关系上,笔者以为实应采陈寅恪所言,在固守中华文明之本体的同时,以科学的、开放的、包容的态度对待域外之文明。如此,方能真正有益于中华文明自身之发展,并推动人类文明间的互动与互鉴。反之,如果抱持狭隘的地域论、单向度地强调中华文化之于世界的影响与贡献,则将强化国人狭隘的文化自信,所唤起的是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由此将阻碍文明之间应有的取鉴。

(本文作者:吴原元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①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② 孟宪承讲,虞斌麟记:《欧洲之汉学》,《国学界》(创刊号)1937年5月15日。

③ 转引自龚鹏程主编《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9~102页。

④ 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第6页。

⑤ Berthold Laufer, “Some Fundamental Idea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1914(2).

⑥ 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第410页。

⑦ 陈寅恪:《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卷审查报告书》,(天津)《大公报》1933年2月20日。